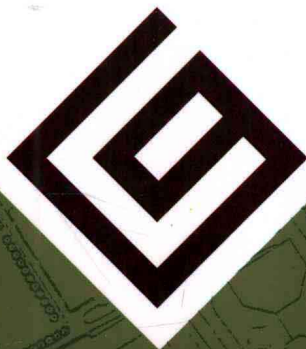


“十一五”国家图书重大工程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城市化建设丛书



中国城市社会空间 结构转型

李志刚 顾朝林 著

Urbanization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十一五”国家图书重大工程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城市化建设丛书

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转型

李志刚 顾朝林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 南京 •

内 容 简 介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目前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城市时代”,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城市空间的重构与转型规模巨大、史无前例。本书集中展现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社会空间的变化,综合采用社会调查、定性定量分析等研究方法,尤其以微观视角为主,着眼于当代中国城市新社会空间的经济、社会、文化、空间和政治特征及其政策研究,反映了国内外城市社会空间研究领域的研究前沿成果。

本书可供中国城市规划、城市地理和城市研究领域的研究人员阅读和参考,也可作为相关科研院校教师、研究人员和学生的教学参考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转型/李志刚,顾朝林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1. 3

(中国城市化建设丛书)

ISBN 978-7-5641-2600-1

I. ①中… II. ①李…②顾… III. ①城市社会学—研究—中国 IV. ①C912. 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64397 号

出版发行: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南京市四牌楼 2 号 邮编:210096

出 版 人:江建中

网 址:<http://www.seupress.com>

电子邮箱:press@seu.edu.cn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江苏兴化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00 mm×1000 mm 1/16

印 张:20

字 数:304 千

版 次: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41-2600-1

定 价:49.00 元

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读者服务部联系。电话(传真):025-83792328

前 言

21 世纪伊始,快速工业化、城市化下的中国社会格局日益分化。尤其自 1990 年代后半期以来,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化,社会贫富分化明显加剧,社会阶层化的空间化进程加速,城市空间急剧分化。城市社会空间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热点问题,而社会矛盾也常常会体现为空间资源分配或争夺的矛盾(典型的如蜗居、“最牛钉子户”、蚁族等现象)。本质上,社会群体的差别正越来越体现在其所聚居的社会空间差别,无论是就物质空间、文化格局还是行为模式来看,差别、分异、破碎化的新格局正在产生。目前,尽管针对社会空间结构的研究已经开始大量出现,但我们还缺乏对于中国城市社会空间本身的系统研究,尤其从微观视角入手,对典型社会空间进行深度解析的系统研究,则尚不多见。进入新世纪,城市社会转型下的城市社会空间变化更为剧烈,对于城市所出现的各类新社会空间(如外国人社区、城中村等)进行深度研究的工作正变得日趋必要。为此,本书就当前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转型与重构展开理论与实证探索,尤其以比较典型的社会空间为实证对象,通过定量分析、定性分析、理论分析和案例分析等手段,对当代中国的社会空间展开系统研究。本书所涉及的案例城市有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深圳等地。

本书总体可以划分为理论研究、结构研究和案例社会空间研究三部分。其中前三个章节构成本书的理论部分。第 1 章就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社会空间重构的基本状况进行介绍和分析,特别是对中国城市转型的特定状况及其社会空间转型机制进行介绍。第 2 章对西方城市社会空间重构的历史演化进程进行分析,对历史上的社会空间现象进行解读,尤其着重探讨全球化、市场化背景下的国家、市场和社会在塑造城市社会空间上的一般模式与规律,为后文的中国研究建立一个理论辩论与研讨的比照平台。第 3 章则具体分析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转型与历史演化。此章将通过长历史的视角,以历史学、城市学和建筑学方法与素材为主要工具,揭示中国城市社会空间演化的长历史规律。重点对中国城市“单位时代”的社会空间、后改革时代的城市社会空间问题进行具体探讨,尤其关注的问题有:是否中国城市的社会空间结构与西方城市步入趋同、抑或

差别迥异,其原因是什么,其中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影响如何,等等。

第4章和第5章是本书的社会空间结构研究部分。这一部分以两个案例:北京和上海为对象,就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构成与分异问题进行解析。其中第4章以北京为例,利用传统的因子生态分析法对社会空间结构展开研究。这一部分首先对北京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历史演变进行分析,描述千年古都波澜壮阔的社会空间演化历程。之后,本章对塑造北京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主要动力予以解析,探讨城市功能结构演化、外国直接投资(FDI)、外来人口等要素对社会空间结构变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北京社会空间结构格局,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就空间结构进行划分,得出北京社会空间的几个类型。第5章则以上海为例,探讨当前中国城市社会分化的状况,特别是社会空间分异的程度问题。首先本章从“全球城市极化”理论出发,探讨目前上海的社会极化趋向,发现上海的社会极化趋向与已有全球城市存在类似之处,但由于上海目前的发展阶段以及国家的强力介入,上海的社会极化并未达到“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等的程度。之后,采用第5次人口普查资料,对社会空间分异的程度进行测算,发现21世纪初期上海的社会空间分异表现为高度的住房分异与较低的社会群体分异并存的格局,这就表明,尽管上海目前已经朝向明显的居住分异发展,但由于计划经济时期混居历史的存在,其居住分异的强度并不高。研究还表明,在可预见的将来,上海的社会空间分异将进一步加剧。

此后,文章进入专门针对案例城市新社会空间分析的部分。第6章对城市贫困及其空间问题展开研究。以南京为例,探讨了当前中国城市贫困及其空间化的基本状况与模式。在针对国内外已有研究与理论进行评述的基础上,对南京城市贫困的社会空间分布、典型地区、结构化原因及其发展演化机制进行梳理,并对未来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应对模式进行探讨。与第6章相对,第7章则以北京的新富裕阶层及其社会空间为研究对象,展示出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另一极画面。本章首先对中国与北京的城市富裕阶层状况进行分析,揭示了新近形成的高收入家庭所具有的社会经济特征及其生活方式。在此基础上,对北京富裕阶层的社会空间分布进行研究,同时对行为模式、消费模式等多方面问题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文中提出了此类社会空间的出现对于城市规划与管理的新要求与应对策略。

第8章则将画面指向中国城市的“新移民社区”,针对中国快速城市

化下所出现的“新移民社会空间”如河南村、新疆村、浙江村等多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本章以北京为例,展示了此类社会空间所具有的丰富社会内涵、空间形态与结构景观,对不同类别的新移民社区发展与形成原因进行解析。尤其以浙江村为重点分析对象,探讨这一新社会空间的形成过程与发展机制,展示出这一特定的流动群体通过“浙江村”这一特定场域实现社会经济地位提升的过程。

第9章以城中村为分析对象,探讨中国快速城市化转型中所出现的一类特殊社会空间现象。本章以广州、深圳等珠三角城市为案例对象,对这一“非正规”的社会空间场域的形成、演化、发展与改造进行系统分析。本章指出,作为快速城市化时期特定的社会空间现象,城中村的存在既有其粗放发展所必然具有的缺点,但也有其存在的积极意义。近来广州、深圳等地强力推进的城中村改造则表明,无论是市场力所主导的改造、政府引导的改造或是多数村集体所主导的“自改”,其最终结果终将带来这一“转型社区”体制的全面“转型”,空间的终结也意味着乡土社会的终结。

第10章将分析视角投向全球化本身,分析在全球化的直接作用下中国城市所出现的一类“跨国社会空间”——外国人社区。本章将以广州小北路等地的非洲人社区为研究对象,探讨此类社会空间的发展演化格局与机制。研究表明,广州小北路、三元里等地黑人社区的发展与珠三角地区的“世界工厂”地位密切联系,加之非洲普遍缺乏制造业、非正规就业特别是街头贸易的普遍存在,使得此类“嵌入”式的跨国社会空间开始在中国出现。依靠其内生的社区网络关系与地方经济之间的密切互动,广州的非洲客商已经发展出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空间,成为全球化“内嵌”入中国大陆的新型社会空间。研究表明,这一社会空间处于复杂的“地方互动”局面,特别是在政府的强力影响之下,社区、城市、国家与国际等不同尺度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要素对其具有不同影响,使得这一社区的未来处于不确定之中。

最后将对全文所进行的理论与实证分析进行总结,指出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的分异和碎化趋向表明中国城市社会正由“差序格局”转向“团体格局”,进而表现为一种混合性的“属地格局”:这一格局兼具“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二者特点。我们认为,“属地格局”是当代“中国式城市社会空间”的核心,这一新格局的出现预示了中国城市所面临的千年之变。

目 录

1 绪论	1
1.1 空间:一个分析当代中国的重要维度	2
1.2 全球化下的城市社会空间转型	6
1.3 中国新城市社会空间	10
1.4 研究方法设计	17
1.5 本书结构	21
2 西方城市社会空间的演化	25
2.1 城市社会空间的历史演化	25
2.2 当代西方城市社会空间重构	30
2.3 西方城市社会空间演化动力	44
3 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的演化	48
3.1 传统中国城市社会空间演变	48
3.2 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的演变	59
4 北京城市社会空间重构	65
4.1 城市社会空间演变	65
4.2 城市社会空间演变机制	72
4.3 城市社会区分析	77
5 上海城市社会空间分异	94
5.1 快速城市社会分异	94
5.2 就业人口的空间分异	97
5.3 外来人口的空间分异	102
5.4 教育水平空间分异	103
5.5 城市社会空间分析	105
5.6 空间分异度	118

6 新城市贫困空间	123
6.1 城市贫困理论	123
6.2 中国城市贫困阶层特征	129
6.3 南京新城市贫困空间实证研究	144
6.4 南京城市贫困空间产生原因与社会机制	156
6.5 城市贫困的社会空间效应	164
6.6 消除城市贫困对策	171
7 城市新贵社会空间	178
7.1 城市富裕阶层理论	178
7.2 中国城市富裕阶层现状	181
7.3 北京城市富裕阶层调查	188
7.4 新富裕阶层对城市规划的影响	203
8 城市新移民空间	206
8.1 “新移民社区”的兴起	206
8.2 北京“新移民空间”调查	211
8.3 浙江村	221
9 非正规城市社会空间	227
9.1 城中村:“非正规”社会空间	227
9.2 “城中村”的起源与特征	228
9.3 “城中村”的改制与改造	246
9.4 “城中村”改造案例	251
10 “全球化”城市社会空间	257
10.1 广州黑人社区产生的背景	257
10.2 广州的“全球化”社会空间	261
10.3 广州黑人区的形成与演进	264
10.4 黑人区的要素分析	268
10.5 黑人区的地方响应	274

11 建设和谐城市	284
11.1 从“差序格局”到“属地格局”	286
11.2 城市空间的“转型与重构”	289
11.3 建设城市和谐社会	291
参考文献	293
后记	306

1 绪 论

21 世纪伊始,快速工业化、城市化下的中国社会格局日益分化。尤其自 1998 年以来,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社会贫富分化明显加剧,阶层分化的空间化进程加速,市场化、全球化和外来移民合力之下的城市居住空间急剧分化(Logan, 2001)。快速城市化下的“城中村”日渐增多,社会空间资源面临史无前例的再分配与结构重组。城市社会空间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热点问题。论述城市社会空间,首先需要从社会空间说起。社会空间(social space)与物质空间(physical space)都是城市空间研究的主要内容,具有泛指与特指两重含义:社会空间可以用来泛指一切人类所感知或体验的空间,大到全球、国家、区域,小到城市、社区乃至住房(Knox and Pinch, 2000);对特指而言,社会空间则指代的是具有相同社会经济属性、宗族种族乃至行为心理的社会群体所占有的空间,典型的如唐人街、贫民窟、富人区或同性恋社区等。随着资本主义及其一体化市场的全球性扩张,生产关系的矛盾也越来越由生产空间(单位、厂房、公司)转向社会空间(社区、楼盘、街道)(Logan and Molotch, 1987),也就是说,社会群体的差别正越来越体现在其所聚居的社会空间差别,无论是就物质空间、文化格局还是行为模式而言,均是如此。目前,我们还缺乏对于中国城市社会空间转型的系统研究,已有的大量研究对转型以来的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如顾朝林(2003)、薛凤旋(Sit, 1995)、冯健、周一星等对北京的研究(Feng and Zhou, 2003; Feng et al., 2007; Xi et al., 2007; Feng et al., 2008),叶嘉安、许学强、周春山、郑静等对广州的研究(Yeh and Wu, 1995),王兴中(2000)对西安的研究,柴彦威(1996)等对兰州单位社区的研究,吴启焰等对南京的研究(吴启焰,2001),李志刚(李志刚等 2004;李志刚,吴缚龙 2006)、杨上广(2006)、黄怡(2006)、宣国富(2010)等对上海的研究,以及吴骏莲(2005)等对南昌社会空间结构的因子生态分析。进入新世纪,城市社会转型下的空间变化更为剧烈,本书就当前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转型与重构展开理论与实证探索。

1.1 空间：一个分析当代中国的重要维度

“空间”作为一个概念，在西方文明中经历了从绝对空间，到功能空间，再到社会空间的认知演变^①〔列斐伏尔(Lefebvre)将对空间的认知归为四种“假设”，2008〕。这种变化自是依于时代变迁所呈现出的不同面向，以及人们不断加深的理解力。城市社会空间这一概念，指的即是城市在社会与经济方面呈现的空间状态或特征；社会空间是空间的实际范围与人们领悟的空间范围的复合体，由主观部分和客观部分组成。

《淮南子·齐俗训》云：“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中国传统观念里与西方“时空”相对应的概念“宇宙”，有一种朴素的被用于将感官材料进行分类和命名的倾向，有些类似于亚里士多德作为范畴的时间和空间。而自笛卡儿开始直至康德、黑格尔，空间则被认为是一种纯粹的形式，空间成为抽象的空间，一种绝对的理念。与流动的、弹性的、充满活力的时间相对，空间是静止的、固定的、僵死的和受社会与政治左右的——它是“空”的，是社会变化和历史演进的容器或道具而已(Foucault, 1980)。这时的空间是先验的，先于所有填充它的东西存在，是一个可以脱离历史时间的空壳，是“绝对的”空间^②。

后来，随着人类生产劳动的发展和不断进行的劳动分工，让空间成为产品和物品总集所占有的一般性场所，空间变为商业的空间、居住的空间、生产的空间。原先精神和理念的空间被现实化和客观化，成为功能性的、工具性的空间，被用于生产和消费。而一旦空间与人类生产、生活相结合，便从此具有社会性^③。于是，“(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So-

① 列斐伏尔曾在一次演讲中将对空间的认知归为四种“假设”；而在《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开篇就梳理了物质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三者的分离。

② 其实，除了后面所说的社会方面的发展，自然科学的进步也在逐渐挑战“绝对时空观”。例如在近代天体物理以及量子力学那里，时间与空间取决于它们所处的引力场以及相互之间的运动状态，两者不再是两个互不影响绝不相干的宇宙参数，而是相互渗透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但自然科学的时空概念演变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对于自然科学里的时空观对哲学家和地理学者时空观的影响，可以参见 Doreen Massey(2005)在《论空间》(For Space)(2005)中的论述。

③ 同样的，时间的概念也越来越有社会性(当太阳升起的时间成为工作开始的社会时间……)，随着政治经济的实践一同变化。哈维(D. Harvey)举例说，小时是13世纪的发明，分秒则迟至17世纪才成为通用的度量标准。时间对资本主义尤其重要，因为社会劳动时间乃是价值的衡量标准，而剩余社会劳动时间，则位居于利润来源的核心(1993)。

cial) space is a (social) product (Lefebvre, 1991, p. 26)], 社会空间应运而生, 空间变成社会关系的现实化和物化(商品)。“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我们得以安置个体与事物的虚空(void)之中, 而是生活在一组关系之中”(Foucault, 2001)。地理空间组织恰是内在于生产关系本身(Massey, 2005)。

在仅仅是功能性的空间中, 空间是一种工具和媒介, 被用于生产、居住或者统治; 但社会性的空间, 则根植于生产模式, 以及以此生产模式为特征的社会关系之中(Harvey, 2002)。如同索亚(Edward Soja)的“社会-空间辩证法”(socio-spatial dialectic), 认为有组织的空间结构本身代表了对整个生产关系组成成分的辩证限定, 这种关系既是社会的, 又是空间的(比如“统治—剥削”的社会结构与“核心—边缘”的空间结构相互对应)(1990, 2004)。于是, (社会)空间可以表达整体的生产关系, 并反映社会中全部活动的普遍目的和共同方向, 空间的内容与形式相互结合, 整个社会产生出了“一个”空间^①(Lefebvre, 2008)。

另一方面这也表明, 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确有一种空间性存在, 它将自己投射(project)于空间, 铭刻于空间, 并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制造了空间。倘若一种社会关系无法变成空间, 那它只能处于纯粹的抽象, 只能是一句空话(Lefebvre, 1991)。正是因为空间与社会(关系)的相互建构和密不可分(Massey, 1984), 任何一种生产关系才都在努力生产与自身相适应的空间, 以确保自身存活。在此, 空间同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联系在一起——空间变成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的场所(Lefebvre, 2008, 2003)。

正是基于对“空间—社会关系”这样一个认识论的转变, 西方地理学界才涌现出一系列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空间而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关系的作品(如 Harvey, Soja, Castells, Massey 等人)。因此, 我们才可通过研究中国城市空间的方式研究它的社会、历史演进, 研究空间的特性就等于研究社会关系, 空间的矛盾与社会关系的矛盾相辅相成。这些, 是本研究得以开始的一个理论认知起点。

1.1.1 空间的生产

由于空间—社会的这种对应关系, 列斐伏尔在其理论中指出, 每个社

^① 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会形态都有自己对应的社会空间。即每个社会都处于既定的生产模式架构里,内含于这个架构的特殊性质形塑了空间,同时空间不断生产社会关系。而人类社会也正是在这种社会与空间在历史的辩证性互动中不断前进(Lefebvre, 1991)。

列斐伏尔展示的空间生产出的欧洲社会历史历程如下:①绝对空间:自然。②神圣空间:埃及式的神庙与暴君统治的国家。③历史性空间:希腊式城邦,罗马帝国。④抽象空间: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空间。⑤矛盾性空间:当代全球化资本主义与地方化对立的空間。⑥差异性空间:重估差异与生活经验的未来空间(Lefebvre, 1991)。而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抽象空间和当代矛盾性空间的阐释最契合我们现在所遭遇的一切,也因此成为后来许多地理学者的灵感之源。

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与新资本主义生产了一个抽象空间,在国家与国际的层面上反映为商业世界、货币的权力网络和国家间的政治契约。这个抽象的空间有赖于银行、商业和主要生产中心所构成的巨大网络(Lefebvre, 2003)。而在城市尺度,其空间的生产,则是资本主义扩张的最主要方式。首先,空间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它被用来生产剩余价值。土地、阳光、空气都被纳入生产力与产物之中。其次,城市结构因其沟通与交换的多重网络(如公路、铁路),成为生产工具的一部分。同时城市及其各种设施(如港口、火车站)亦是资本的一部分。于是,资本主义的空间不只是生产资料(如厂房、土地),还是消费对象(如海滨度假区、迪斯尼乐园),也是政治工具(如规划手段、警察管制空间),并且被用来巩固生产力与财产之间的关系(如豪华社区对富人及其财产的庇护),同时还可以充当上层建筑的一种形式(如公路系统表面上中立却通过运送原材料和商品为资本主义企业提供便利)(Lefebvre, 2003)。因此,空间被同时列为生产力、生产资料、生产的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尤其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的一部分。由于每一种社会状态的存活都依赖于对空间的占有和不断再生产,以得到与自己相适应的空间(列斐伏尔列举了前苏联作为反例),于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全面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即从涉及商品生产投资的“资本第一循环”转向对土地、道路、建筑物投入的“资本第二循环”,以确保自己的持续存在(Lefebvre, 1978, 1991; Harvey, 1973)。所以,对城市而言,利用生产产品创造利润变得不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生产铁路运输线与高速公路等为生产提

供坦途、运输原料与销售产品的空间,它们也能创造大量的利润。同时,还要配备相应保障这类空间生产的统治策略,以确保利润的获得可以持久。

1.1.2 空间的逻辑

如果说列斐伏尔阐释出了资本主义是通过空间的生产而生存下来,那么哈维则补充说明空间生产对资本主义为什么重要(Harvey, 1975; 1985)。在哈维看来,资本主义的核心关注是经济,而最关键的经济问题就是资本问题。于是,解决资本累积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是资本主义的首要任务,资本盈余也成为哈维对资本主义逻辑分析的重点。

在《资本论的界限》(*The Limits to Capital*)(1982)中,哈维延续马克思的解释框架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危机——过剩的资本(可表现为闲置的生产能力和流动过剩的资金)和劳动力(可表现为攀升的失业率),并且给出他的解决方案:把它们存入未来,而非现在使用。例如通过道路桥梁建设等长期投资项目,将部分资本在一个较长时段内(取决于其经济和物理寿命),以某种物理形式完全固定在国土之中或者国土之上,或者通过国家投入社会支出(如公共教育或医疗保险体系)使得资本在地理上被固定下来。如此便通过构建固定社会地域结构,推迟了资本价值在未来重新进入流通领域的时间,将资本积累的时间障碍转变为空间障碍的过程。

而在《资本的城市化》中,哈维更详尽地阐述了资本通过城市建设(即空间化)解决危机的过程及其矛盾:资本不只是单单投入到地理环境之中,它需要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创造可以持续累积的条件。首先,资本由它自己可能创造的物理地貌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存在,它创造一种特别的地形或城市地理为使用价值,以加快资本积累。例如资本投资建设出适合于原材料和商品运送的城市或区域性交通网络。于是,空间/领土与资本(主义)的逻辑交织在一起:资本需要流动——这是资本的本性;资本又需要固定——这是资本主义得以继续的方式。这个资本主义“内部运作”的逻辑被哈维表述为一个专业术语:空间修复(spatial fix)。在《新帝国主义》一书中,他进一步将其升级为“时空修复”(spatio-temporal fix),用以表述上述资本空间化的过程,同时喻指通过时间延迟和地理扩张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特殊方法。

但是,“修复”并不意味着能够完全摆脱资本主义内在危机,它会带来其他的问题:投资于生产设施和社会支出的确暂时缓和了流动资本过度

积累的问题,但大量投资于工厂、交通设施、教育系统同样会出现盈余,产生新的过度积累问题;甚至城市建成环境本身的固定性,使得资本主义累积受制于特殊的空间位置投资,而这些投资一段时间后不再那么有效(比如地价上升、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污染等),并且这些大量固定在空间中的资本还会成为在其他空间实现修复的障碍(Harvey, 2009; Jessop, 2006)。如此便打断了原先持续性的资本循环和资本累积。

但全球化帮助了这一再次出现的过度积累问题。通过长期资本项目或社会支出来缓解大量的劳动盈余和资本盈余的方法是其一,还有一种办法是在新的地点开发市场进行空间转移。于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其领土之外,即在那些资金匮乏的发展中国家,开辟出新的累积空间。在这个时间的节点,中国因其改革开放加入全球生产链条,而同西方(主要是美国)的转变一起被纳入统一的解释框架:中国吸纳巨额外资使其自身拥有了临时性的“时空修复”能力,因而缓解了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过度积累的问题,同时也促成了中国内部市场经济的飞速成长。当然,资本主义国家也将自身的内在性危机转移到了中国:倘若这些建立在赤字财政基础上、固定在空间中的投资不能及时使它们的价值返回资本累进过程,中国的经济发展将遭受损害。哈维指出,这种新时代的地理扩张和空间重组是一种“剥夺性累积”,并把将这种权力的领土逻辑和资本主义的逻辑交织,延伸出所谓的新帝国主义(Harvey, 2009)。

悬而未决的是,中国是否仅仅成为资本主义国家释放过剩资本和进行剥夺累积的一个区域性空间?还是借助资本,中国真正成长起来,并且改变了在它漫长文明历史中从来不曾改变的一些东西?这也正是本书希望可以探寻答案的问题。

1.2 全球化下的城市社会空间转型

20 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通信交流、交通通勤技术等急速发展,全球化已经将世界连成紧密联系的一个整体,人们仿佛置身于不断缩小的“地球村”之中,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均被急剧压缩。如同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著名的“时空压缩”(tempo-spatial compression)概念所描述的:当今世界的时间和空间均被压缩,以至于距离开始变得不那么重要(Harvey, 2000)。《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omas

L. Friedmann)在其《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将全球化划分为三个阶段:全球化1.0, 2.0和3.0。他指出,“全球化1.0”开始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时,持续到1800年前后,由劳动力推动,这期间主要是国家间融合;“全球化2.0”是公司之间的融合,从1800年到2000年,各种科技硬件的发明和革新成为这次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蒸汽船、铁路、电话、计算机等等,这期间曾因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而被迫中断;在“全球化3.0”中,个人成为主角。软件不断创新,网络不断普及,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通过因特网轻松实现自己的社会分工。他认为,正是由于新一波的全球化,一切疆界正在消失,世界变小也变平了。这一观点似乎表明,世界各地的差异正在不断被抹平,而地理也正变得不再重要。正是这一看似正确的观点带来激烈争论,典型的如沙斯克亚·萨森(Saskia Sassen),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朵琳·玛希(Doreen Massey)等。他们指出,没有各类空间设施的地理存在,就不会有今日信息传播的“扁平化”;而经济社会活动的跨边界运作与全球化,则恰恰凸显出特定功能(如命令、生产性服务业)的地理集聚的重要性;也正因如此,新的“权利的空间几何学”(power geometry)已经出现,地理资源的空间分布不是更平等了,而恰恰是更为不平等了(Massey, 2002)。作为结果,“世界不是平的”、“世界是尖的”等观点不断出现。而要准确把握全球化下的社会、城市与空间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们需要将目光更为精确地投射到表象之下,去观察我们的社会空间正在发生的深刻转型。近年来,无论是对全球城市体系的顶端城市“全球城市”、“世界城市”的研究,还是对其他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城市的研究,均表明了社会空间不平等的加剧趋势。

1.2.1 “全球城市”的社会与空间极化

通过对全球城市:纽约、伦敦和东京的研究,社会学家沙斯克亚·萨森指出,此类全球化影响最甚的城市表现出明显的社会和空间极化特征,“总的结果,是收入差距变得更大了”(2001)。城市几乎成为名副其实的“双城”(dual city),富与穷,白与黑,天堂与地狱,差别迥异的两类群体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全球化最为密集的地区相遇,进而塑造出极为不平等的社会空间格局(Mollenkopf and Castells, 1991)。

全球化表现为明显带动或推动不平等趋势的力量,与全球化联系甚为紧密的地区,其社会分化与空间分异的强度也更为剧烈。一方面,尽管经济联系的全球化带来经济活动的地理分散乃至跨国经营,这一边界扩

张也带来了对于中心控制功能的更大依赖与更高要求,进而使得特定精英群体的城市聚集成为必需,典型的如纽约、东京等地;另一方面,全球化下人口的自由流动使得大量跨国移民在此类城市聚集,而他们所填补的则是低端劳动力市场与服务业,以此维系整个城市的运行与再生产。例如,在纽约中央公园,每天都可以看到诸多带着白人小孩游嬉的黑人保姆;多数纽约的售货员、服务员均为拉美裔移民。

事实上,社会极化及其对城市空间影响是当代城市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当前西方城市正处于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转型期,更具流动性的生产劳动模式带来新的管理和控制手段(Amin, 1994)。经济国际化和信息技术的成熟发展,以及资本与劳动流变动的加剧等原因促成全球生产活动的分散化重组。在产业结构上,一方面是工业、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造成西方城市普遍“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另一方面是“生产者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商业、银行、传媒、金融等)(producer service)在“全球城市”集聚以发挥全球性的管理控制功能。“世界城市”假说指出,资本运作的矛盾将突出表现在世界城市(Friedmann and Wolff, 1982);萨森则指出“全球城市”(global city)纽约、伦敦和东京正出现社会极化(Sassen, 2001)。跨国公司总部和国际精英人才集聚,工业、制造业紧缩,服务业增长;日益增加的国际移民为城市低技术、低工资的服务业发展提供劳动力;社会结构的两端膨胀而中间段减小。弗里德曼和萨森认为社会极化将带来空间极化,城市居住空间随之变得“分化”、“碎化”(Sassen, 2001)。

极化的社会空间将不仅在全球城市存在,而且将出现在全球化影响下的其他级别的城市。但是,这一假设颇具争论,由此引来诸多论战。例如,通过研究英国伦敦和荷兰兰斯塔德(Ranstad)地区的职业变化,汉姆莱特(Chris Hamnett)指出,欧洲福利国家的城市社会分化并非是极化而是职业化(Professionalisation),社会结构表现为两头小,中间大。他把萨森的研究结果归因于美国城市特殊的发展元素——大规模外来移民(Hamnett, 1996)。但是,伯格(Burgers)对汉姆莱特所用数据进行再分析,发现如果将郊区数据记入,其结果仍是极化(Burgers, 1996)。对这一假设的检验扩展到其他全球城市;巴姆(Baum)对新加坡的研究表明其分异表现为职业化(Baum, 1999),而瓦塞尔(Wessel)对挪威奥斯陆的研究则发现由于政府福利机制的影响,社会空间分异的程度没有增加(Wessel, 2000)。根据实证研究,希尔(Hill)和金(Kim)认为全球城市极